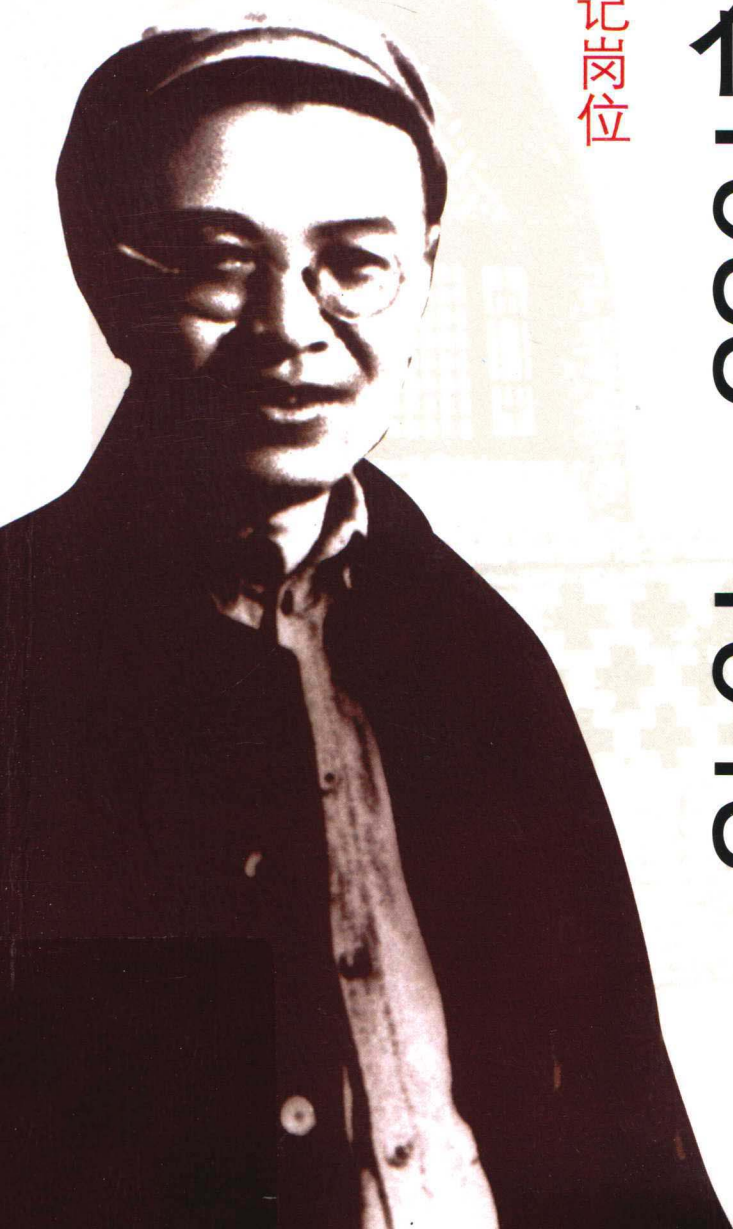


转折关头

程中原 著

张闻天在1935—1943

讲述中共中央总书记岗位
上的张闻天



程中原 著

转折关头

张闻天在1935—1943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折关头：张闻天在 1935—1943/程中原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2

ISBN 978-7-5154-0111-9

I. ①转… II. ①程… III. ①张闻天 (1900~1976) —生平事迹—1935—1943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3518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陈立旭
责任编辑 陈立旭
责任校对 周 浩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32 幅 27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1942 年张闻天在晋西农村调查时留影

引 言

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有建树的一任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于1979年8月25日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说，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称“总书记”）*起，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在这三年多时间里，张闻天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代领袖。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

遵义会议推选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1932年冬，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张闻天作为政治局常委之一，就同总书记博古在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要不要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抗日、要不要支持福建事变）等方面发生分歧，进行争论。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围绕广昌战役的战略策略问题，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张闻天同博古的矛盾（称“博洛矛盾”）逐渐加深、张闻天在中央高层受到排挤的同时，他同毛泽东的关系密切起来，许多重要观点趋向一致。张闻天写了一系列批评“左”倾错误的文章，并在长征出发前发表了称为长征“动员令”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在长征出发时，他同毛泽东、王稼祥结成“中央队三人团”。湘江战役失利以后，“中央队三人团”在政治局内部开展了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斗争，提出并坚持中央红军正确的战略方向；促使政治局作出召开遵义会议的决定；张闻天还首先提议请毛泽东出来担任军事指挥。在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又是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作反报告——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对遵义会议的胜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见，从反五次“围剿”到遵义会议，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一直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最前列。同时，他当时是在党内职位仅次于博古的领导人，又是共产国际培养和信任的干部。在遵义会议后，推举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势所

必然，是历史的选择。

在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问题上，曾经有过这样那样不同的解释。本书上篇，依据历史事实，叙述张闻天从犯有“左”倾错误到站在最前列同“左”倾错误进行斗争的过程，说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历史必然性。在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内没有比张闻天更合适的人选。这是本书想要说明的第一个重大历史问题。

本书想要说明的第二个重大历史问题是：张闻天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五朝领袖”，他当总书记当得怎么样？

张闻天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危难之际，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挑起中央总书记这副历史重担的。他担任总书记后，立即起草并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及时向中央红军、向全国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领导机构，传达贯彻了遵义会议精神，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长征途中，他又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一起，团结全党全军，同张国焘的退却逃跑和右倾分裂进行了斗争，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这时，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紧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剧、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张闻天又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一起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领导全党实现了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他亲自率红军渡过黄河东征，扩大、巩固了陕北根据地；他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放蒋”后内战一触即发之际，亲赴西安，坐镇处理，维持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局面，维持了国内和平；他和毛泽东一起指导了同国民党的谈判，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成立，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发展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武装力量。张闻天这一任总书记，被毛泽东称为“明君”，他坚持民主作风，发扬党内民主，备受全党赞扬。相信读者读过本书之后能够得出结论：张闻天这位总书记是有职有权的，是当得好的，在两个历史转折关头，是有大作为的。

本书讲述的第三个问题是，张闻天是怎样离开总书记岗位的？

张闻天一心为党，不争权，不专权。长征途中，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他主动提出把总书记让给张国焘。毛泽东不同意，说张国焘看重的是军权，不一定要。如果真让他当了，一旦擅权，非常危险。1939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

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意见。张闻天立即将总书记的职权逐步转移给毛泽东。不仅如此，为了党的全局利益，他又严格进行自我批评，自觉检讨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还主动提出“还账”、“补课”的请求，并身体力行，于1942年初带队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调查，为全党树立了自我批评的典范，为全党作出了用实际行动纠正错误的榜样。本书下篇叙述张闻天完成担任总书记的历史使命以后，主动让贤，离开总书记岗位，自觉进行自我批评，并用实际行动“还账”、“补课”的经过，其理论与实际统一的作风，其人格的完美、品德的高尚，足为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楷模！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和重大战略转变时期的总书记，张闻天没有辜负党的重托，确实达到了三不朽的要求。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立下的功，彪炳日月，光照千秋。他的策略思想和理论著作，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他的道德情操，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典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业绩、言行，愿他的道德、情操，永垂青史，流芳百世。

* 见邓小平在张闻天追悼会上所读悼词，载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关于博洛交接后张闻天所任职务有两种说法。一种为：“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2011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第19版）。另一种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采取这种说法的有：一、张闻天的《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写道：“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总书记”。张闻天又写道，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在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毛泽东为首）后，张闻天就已向毛泽东“多次提出解放总书记”，即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毛泽东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担当下去。张闻天认为毛既然要他名义上仍“任总书记”，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还检讨说：“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据中央档案馆所存手稿）二、周恩来在1971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在扎西川滇贵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据《张闻天图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三、邓小平《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1979年8月25日）说，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被推选为总书记。”邓小平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4日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四、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中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

以洛甫同志代表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陈云在1977年8月23日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五、彭德怀写的自传材料在讲到1935年八九月间张国焘对张闻天的态度时说：“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六、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七、伍修权在回忆长征和张闻天的文章中说：“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伟大的长征》，《回忆与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尔后他又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追求真理锲而不舍》，同上书，第560页）八、黄克诚在一篇文章中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但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九、1981年1月5日胡乔木致夏衍信说，“中央书记处于〔1937年〕12月进行了改组，中央不再设总书记”，张闻天“才不任总书记”。（《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十、1982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说：“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转引自《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本书为行文方便，依邓小平所致悼词用“总书记”的习称来指称遵义会议后负中共中央总的责任的张闻天。

另外，决定博洛交接的常委会开会的具体地点不能完全确定。有人说，从实地察看，常委会开会的花房子的可能性大些。这里有一所木结构的、有雕花装饰的房子，五开间，是周围较大的房子。不过，据当时目击者称，这里有不少电线，还架设了天线。估计驻扎的是通讯部门。我认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点很可能在紧靠花房子西边一点的村庄高坎。

** 毛泽东1964年4月16日的一次讲话，转引自何方：《何方谈史忆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同日本社会党人士的一次谈话，1964年7月10日。又，张培森《为总书记张闻天正名》一文（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引毛泽东1964年7月10日同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说：我们这个党有过“几朝领袖”，第一代是陈独秀，第二代是向忠发、李立三，第三代是陈绍禹（王明），“第四代是张闻天”，“以后就是轮到我了。”

目 录

引言

上篇 历史选择了张闻天

一 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踏上长征路	1
毛洛王组成中央队三人团	1
“博洛矛盾”加深	2
“毛洛合作”发展	6
张闻天发表动员长征的“战略社论”	10
二 长征路上的争论	14
毛洛王征途上的交流	14
过了老山界以后	15
通道“转兵”	16
黎平决策	17
洛王橘林谈话	18
三 遵义会议	19
袭占遵义	19
遵义会议的准备和召开	19
博古作报告	21
张闻天作反报告	21
毛泽东的发言和会议的进展	22
遵义会议的胜利	24

中篇 挑起历史的重担

四 扎西会议	26
2月5日：博洛交接	26

2月5日：决定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	27
2月7日：作出“回兵黔北”决策	28
2月8日：通过《遵义会议决议》	29
2月9日：决定中央红军“缩编”	33
2月9日：决定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	33
2月10日：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34
加强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36
五 张闻天支持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	39
毛泽东重返军事领导岗位	39
二渡赤水，再占遵义	40
张闻天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	40
关于“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	41
张闻天赞成毛泽东参加新的军事“三人团”	42
四渡赤水，跳出敌人包围圈	43
走路与打仗的分歧	43
会理会议克服离心倾向	44
六 从会合到分离	47
强渡大渡河前后	47
懋功会师	48
两河口会议	50
两河口会议之后	52
沙窝会议前后	53
毛儿盖会议前后	57
对张国焘的等待与争取	59
危急关头	60
脱离险区	61
俄界会议	62
七 到陕北落脚	64
到达哈达铺	64
张闻天写读报笔记	65
毛泽东赋长征诗	66
翻越六盘山，向陕北苏区挺进	66
进驻吴起镇	68
下寺湾决策	70
兵分两路	71
八 拉开从内战到抗战的序幕	74
提出新策略	74

“国际代表”到达瓦窑堡	76
张闻天毛泽东的配合合作	77
统一战线策略的新内容	78
改变对富农的策略	80
九 主持瓦窑堡会议	82
瓦窑堡会议的召开	82
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83
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84
瓦窑堡会议的传达贯彻	85
十 打开新局面	87
东征山西	87
回师宣言与西征决策	91
接待美国记者斯诺	93
开展白区工作	95
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	99
十一 实现三大主力会师	106
中央对张国焘的团结争取和朱德等同张国焘的斗争	106
张国焘另立“中央”	107
与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	108
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	111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甘孜会师	115
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一方面军的策应	117
制止张国焘的再度动摇	121
三大主力大会师	125
十二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131
国共两党直接联系的恢复	131
晋西会议调整对蒋策略	133
“五五通电”以后的曲折	136
应对“两广事变”	137
确定“逼蒋抗日”方针	138
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	144
十三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46
西安事变前的形势	146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	146
张闻天主持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	147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逐步形成	148

确定和平调停的策略方针	149
提出六项条件，确定“放蒋”方针	150
“放蒋”后的形势与中共中央的方针	151
内战危机迫在眉睫	152
总书记亲赴西安	152
“二二事件”以后	154
十四 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155
迎接全国抗战新阶段的到来	155
参与领导同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	161
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	168
十五 洛川会议前后	169
主持洛川会议前的政治会议	169
主持洛川会议	172
主持洛川会议后的统一战线座谈会	174
积极贯彻洛川会议的路线方针	175
十六 主管宣传和干部教育	179
概况	179
创办延安马列学院	179
编著革命史教材和编译出版马列著作	190
论青年修养和党的建设	195
宣传鼓动提纲和文化工作政策	200
十七 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	206
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206
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	212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	214

下篇 完成历史使命以后

十八 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内职责的变动	221
主动移交总书记的工作	221
负责局部，关注全局	222
十九 整风前后	226
整风运动的发动	226
提出“还账”与“补课”	229
陕北、晋西北调查	231

出发归来	240
二十 总结历史经验	244
研究党史，写《反省笔记》	244
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45
二十一 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249
后记	253

上篇 历史选择了张闻天

一 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踏上长征路

毛洛王组成中央队三人团

1934年10月10日晚，张闻天（当时通用名洛甫）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向赣南省会于都集结，准备渡过于都河作战略转移。

当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更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那么长的路。那时红军是向西边走，最初的目标是到达湘西同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故尔一开始都把这次战略转移的军事行动称为“西征”。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中去。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提出异议，博古同意毛、张的意见，让他们留在总部。毛泽东邀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就这样，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肚子里还有弹片。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他们随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行动。这个纵队由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供给部、卫生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等组成。

长征出发时，毛、洛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有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一是博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发展。

1932年冬，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实际工作中，以“博洛矛盾”（即中央两位主要领导人博古和洛甫的矛盾）的加深为标志，中央“左”倾领导集体已经出现裂痕，开始分化；而以“毛洛合作”的发展为标志，受“左”倾领导集团打击、排挤的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已经被实践证明为正确，毛和洛已经在同“左”倾错误的矛盾、斗争中取得一致，建立了战友的情谊。

“博洛矛盾”加深

1932年秋冬，张闻天在上海接受“左”倾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的教训，就已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路线，逐步挣脱“左”的桎梏。这一艰难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同犯“左”倾错误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产生、发展、加深的过程。所谓“博洛矛盾”，在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在此期间，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博古共事，虽然工作作风不完全一样，对若干具体问题难免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上，革命目标一致，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两人关系可以说是亲密团结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在实践中逐渐觉察到“左”的危险性，认识到“左”倾也会成为革命前进中的最大的障碍物，反对“左”倾的一面开始滋长。而博古却没有及时觉醒过来。

既然如此，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针、政策上，产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首先产生在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也即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变化的认识上。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的形势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强烈的反响。然而，博古却从下层统一战线和打击中间力量的共产国际的“左”的固定公式出发来理解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认为我们的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的，或者至多是对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说的。至于国民党上级军官，那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去同他们谈什么条件，同他们订立什么共同作战的战斗协定。宣言上的提议只是个宣传口号，是用来揭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的。张闻天则接受了淞沪抗战事实的教育，对在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开始有所认识，纠正了“一·二八”事变后对国民党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对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的对日作战协定的理解同博古大为不同。他认为：“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① 围绕对“共同抗日三条件”应怎样理解的问题，张闻天同博古进行了争论。博古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所以，“宣言”发表以后，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没有采取任何

^① 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主动行动，“宣言”发表以后的八九个月里，也没有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第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

这是博洛之间的又一个分歧点。先是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①，重复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与反对资产阶级并列的特点。博古认为，目前的中国革命不但要“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这是工农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博古主张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基点是“限制”，“在发展苏维埃经济中间、在相当的容忍资本主义发展中间来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章中论述了“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张，提出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显然同将资本主义作为“反对”对象，采取“系统限制”政策大相径庭。博古在随后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第三部分^②中对张闻天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博古强调：“资产阶级将成为我们当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敌人，所以，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是不可允许的”。他认为，对于资本家，“不是‘妥协’政策，而是坚决的发展阶级斗争”；除了消灭他们的反抗，限制他们的剥削之外，应该是“强迫”他们为苏维埃工作。博古不点名地指责张闻天主张的“让步”、“妥协”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这种“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提出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

第三，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发生在“福建事变”前后关于同十九路军的联合和怎样对待“福建事变”上。

193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利用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暂停南侵之机，坐镇庐山，调兵遣将，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执行临时中央“长电”^③的错误指示，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分为中央军和东方军两路反第五次“围剿”，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求胜。从7月至9月，彭德怀统率的东方军在对十九路军作战中发展顺利。连城大战之后，随即进军闽北，每战皆捷，形成挺进福州之势。十九路军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原本就同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在此形势下，听从周围一批进步人士的劝说，决

① 此文先发表了第一、二两部分，载《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② 载《斗争》第16期（1933年6月25日）。此文发表第三部分后即中断。

③ 1933年6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总顾问拟定的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夏季军事计划的指示电。该电文很长，故被称为“长电”。此电批评红一方面军前段军事行动的缺点在于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可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这样做束缚了主力，以致不能“有力打击”北方的敌人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提出从红一方面军抽出若干部队，组成东方军团，进行分离作战。中共中央强调要“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提出以红三军团为东方军团的基干，入闽作战，红一、五军团依计划在抚河、赣江作战。

定变“剿共抗日反蒋”的方针为“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主动派代表秘密前往红军驻地商谈停战反蒋事宜。

第一个来到延平（今南平）前线同红军联络的代表，就是当年张闻天在上海从事新文化运动时的朋友吴明（即陈公培）^①。吴明于1933年9月22日晚在王台八角楼红三军团总部会见了彭德怀。第二天又同彭德怀、袁国平举行会谈。此后，吴明即于10月初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进行正式谈判。

对于同十九路军谈判，博古态度很不相同。博古警惕性很高。他没有拒绝谈判，但疑虑重重。他看不到十九路军将领的进步，总以为他们来谈判很可能是为求一时缓和以待援兵而施的狡计。他仅仅把谈判看成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只想通过谈判来揭露十九路军将领的欺骗，提高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十九路军代表到瑞金谈判时，博古没有会见。张闻天十分重视这次谈判，认为这正是实现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的一个具体行动。如果谈得好，同十九路军停战并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斗争，都有重大的积极影响。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局内具体指导谈判、签约的领导人之一。他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热情接待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促使谈判顺利进行。参加谈判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潘行健（汉年），从白区到苏区，都是张闻天的得力助手。谈判进行了近一个月，双方全权代表于1933年10月26日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草签初步协定之后，苏维埃政府又委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同徐名鸿、吴明等十九路军谈判代表一起赴闽。临行那天早晨，张闻天同毛泽东、林伯渠、邓发等前往送行。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22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十九路军正式签订抗日反蒋协定。当天，张闻天在党内刊物《斗争》上发表《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和反机会主义的斗争》^②，批评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的关门主义方针。指出在全国的民族危机面前，“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可能”，“在个别地方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号召一切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同我们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他认为：“对这种国民党军阀，我们是不怕同他们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的战斗协定的。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纯洁，而是经过这种协定来更进一步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并

^①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叙述：1922年夏天，“那时候肯到寓所来的有张闻天、吴明、汪馥泉诸人，他们当时似乎住在民厚北里，差不多每天都要来一次。”见《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6页。吴明，即陈公培（1901—1968），湖南长沙人。曾参与中共早期建党活动。1920年秋留法勤工俭学。1921年9月因参加里昂学生运动而同李立三、蔡和森等108人被遣送回国。1924年底入黄埔军校，为二期毕业生。北伐时在第四军政治部工作，继任十一军师政治部秘书。参加过南昌起义。潮汕起义失败后经香港赴上海。不久声明脱党。后为陈铭枢幕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参事。

^② 此文发表于1933年11月26日《斗争》第36期，署名洛甫。